

五

体

注用

文

鑄

بەش

تىلىق

مانچۇچ

لۇغەت

ئۇيغۇرچىڭ ئۇيغۇر ئىمپارىتى

مەنچۇچ

ئەغەنەجى

مەنچۇچ

ئۇيغۇرچىڭ ئۇيغۇر ئىمپارىتى

مەنچۇچ

ئەغەنەجى

مەنچۇچ

五	體	清	文	鑑
五	體	清	文	鑑
五	體	清	文	鑑
五	體	清	文	鑑
五	體	清	文	鑑

第 五 函

بېشىڭىز ئەنلىقىنىڭ
مۇقاۋەتلىق ئەنلىقىنىڭ
مۇقاۋەتلىق ئەنلىقىنىڭ
مۇقاۋەتلىق ئەنلىقىنىڭ
مۇقاۋەتلىق ئەنلىقىنىڭ
مۇقاۋەتلىق ئەنلىقىنىڭ

第 六 函

آئىتىپ ئەنلىقىنىڭ
مۇقاۋەتلىق ئەنلىقىنىڭ
مۇقاۋەتلىق ئەنلىقىنىڭ
مۇقاۋەتلىق ئەنلىقىنىڭ
مۇقاۋەتلىق ئەنلىقىنىڭ
مۇقاۋەتلىق ئەنلىقىنىڭ

«بەش تىلىق مانجۇچە لۇغات»

توم - 3

بېيجهن گۈڭۈڭ مۇزىيىدا ساقدانغان .

مملکتی نشریاتی تور پیدا نشر قیمتندی.

شیخوا کتاب ما گازئی تۈرىپىدىن ئاز قىتىلدى .

۱۹۵۷- یکی نوایردا بیعنده برینچی قیمت نشر قلنسوی.

書名：1330(1)055

五体清文鑑

下 册

故宮博物院藏

民族出版社出版

地址：北京国子监胡同9号

北京市印刷研究所

新華書店發行

Digitized by srujanika@gmail.com

1957年11月北京第一版
1957年11月北京第一次印

耗×100%耗量 印張103 1/8

1—9,090 頁 定

報紙本印數：1——9,000 冊 定 價：六 元

统一书号：M17049·6

有關五體清文鑑的一些歷史材料

這部書本身沒有序言，也沒有跋尾，我們在其他的書籍上也未查到有關它的記載，所以成書的年代和著者都沒有直接的材料可以引用。但是從內容看來，可以肯定它是由1771年完成的滿、漢兩種文字的“增訂清文鑑”發展而來的，僅僅加上蒙、藏兩文成為四體，再加維吾爾文成為五體而已。

此外還有純滿文的清文鑑、滿蒙文鑑和三體清文鑑三書，內容與本書雖有出入，但也有密切關係（詳細情況請看附表）。因此，我們敘述一下清文鑑、兩體清文鑑、三體清文鑑和四體清文鑑（注一）的情況，就大體上可以看出這部五體清文鑑的編輯過程方面的一些情況。

一、清文鑑——是1673年開始編纂的。

“康熙12年4月聖祖特諭傅達禮曰：滿、漢文義照字翻譯可通用者甚多，後生子弟漸生差謬。爾任翰林院〔掌院學士〕，可將滿語照漢文字匯發明某字應如何應用，某字當某處用，集成一書使有益于后學。此書不必太急，宜詳慎為之，務期永遠可傳，方為善也”（注二）。但是書沒有完成傅達禮就死去了，康熙另派馬齊、馬爾漢等主持其事，前后共經過35年，到康熙47年（1708年）才完成，共280類，一萬二千余條，附有總綱，就是按字母排列的索引，康熙審定後刊行，題名“清文鑑”。此書在滿文譯學中是第一部綱領鉅制（注三），雖然也有刻本，並收入乾隆38年（1773年）完成的四庫叢要（注四），但是乾隆49年（1784年）完成的四庫全書中未收，所以後世的書里記載也較少。

兩體的有兩種，一是滿、蒙的，一是滿、漢的：

二、滿蒙文鑑——在清文鑑完成後，緊接着就于康熙49年（1710年）在這個基礎上開始了增加蒙文的工作（注五），編者是拉錫等，康熙56年（1717年）完成。所收辭匯與清文鑑相同，用滿、蒙兩種文字注解，但注解下引証的古文成語已刪去（注六），這是後來的三體清文鑑的基礎之一。

三、兩體清文鑑——乾隆時，又命人對康熙時編的清文鑑做了相當大的增刪，刪去了注解里“摭拾陳編章句，及以之乎者也為文者”，改成“日用常言，期人共曉”（注七）。增加了：1.新詞四千七百余條。2.補編四卷，其中收有古代的及罕見的名詞一千六百條。正編和補編共約一萬八千條，也就是說比原書篇幅增加了約二分之一。3.把全部辭匯都譯成漢文，並附有滿文對音，但注解未譯成漢文。4.滿文的漢字切音。乾隆36年（1771年）完成。它的正式名稱是“御制增訂清文鑑”，刻本是乾隆38年（1773年）完成的（注八）。

四、三體清文鑑——兩體清文鑑完成後八年，即乾隆44年（1779年）又

完成了三体清文鑑，它的正式名称是“滿珠、蒙古、漢字三合切音清文鑑”。所謂“三合切音”，就是用漢字標記其他拼音文字的複輔音時，因為過去漢文里使用的兩個字的“反切”不夠確切，而另外創造的一套用三個漢字拼合的標音符號。這種方法至少是在30年以前就已開始形成了（注九），但是到這部書的凡例里，我們才看到它的簡單說明。

這部書與兩體清文鑑比較起來，除增加了蒙文以外，還有相當大的不同：1.沒有補編，正編里的類別和分則較少，辭也少了約三千條，其中重要的如部院類和臣宰類各少約三百條，齒篩器用類少一百余條。2.取消了滿文注解。3.音是三種文字循環標記的，即每一種文字下面都有其他兩種文字的“對音”，滿、蒙兩文字的左邊還有漢字的“切音”。4.有工作人員名單、凡例等。它的刻本完成於乾隆57年（1792年）（注十），即編成後的13年，版刻得比四體精，故宮所藏的一部，紙張和裝幀也都比兩體的精致。總之，它與一體的較近，而與兩體的出入較大。這種情況很奇怪，估計有兩種可能：

（1）它是由清文鑑、滿蒙文鑑直接發展來的，沒有按照兩體清文鑑增添。（2）它是有意識地刪去了一部分。從所少的辭匯的內容看來許多是重要的，所以還是第一種可能性較大。

上述第三、四兩種因為都有乾隆的序言，並且都收入四庫全書經部小學類，所以許多書籍上都有記載，編成的年代都很明確，四體和五體則不如此。

五、四體清文鑑——上面只有滿、藏、蒙、漢四種文字對照的辭匯本文，其他的注音及注解一概沒有，正編和補編的卷、部、類、則等編排及數目與兩體的完全相同，辭匯總數也是一萬八千條左右。由此我們可以看出來它是直接由兩體清文鑑發展而成，並不是在三體的上面增加藏文而成的。因此，它不一定是到1779年以後才進行編譯的，很可能更早一些。

英人道格拉斯（R.K. Douglas）估計它的時代與五體相同，在1790年（乾隆55年）左右（注十一），我們寧可慎重一些估計它編於乾隆36年至60年（1771—1795年）之間。無論如何，從1673年開始修清文鑑到四體和五體的完成，前後經過了一百年以上是可以肯定的。刻本的完成甚至可能是在19世紀初葉。因為清宮史續編完成於1806年，對於乾隆晚年及嘉慶初年皇室的書籍記載甚詳，關於兩體、三體兩書刻本完成的年代記載得很明確，而沒有提到四體、五體兩書。我們所見的關於此書刻本最早的記載是道光30年（1850年）的，實際上當然也會這樣晚（注十二）。

此書也有殿版刻本，但流傳不甚廣（注十三）。以上四種書的殿本木版現在都已散失無存。

此外，北京嵩祝寺天清番經局還有一種“四體合璧文鑑”的刻本，書名與“御制四體清文鑑”不同，但內容與其正編出入不大，只是在漢字旁邊多了滿文的對音，并有滿文索引八卷及滿、蒙文的目錄一卷，而沒有補編，版面設計比殿版緊湊，可以說是一種普及版，流傳甚廣，木版現在尚存。

六、五體清文鑑——其內容在出版者前言里已有敘述。辭汇條數与四体相同，增加的只是一栏維吾尔文及三栏注音而已。至于蒙文和汉文下面为什么沒有滿文对音，这可能有两种理由：1.滿、蒙、汉三种文字的互相注音在三体清文鑑里已經有了，而且很詳細。2.滿文字母是由蒙文字母发展而来的，形体上出入不很大，能讀滿文的人大都能够讀出蒙文音，并且當時認識滿文的人大多數都認識汉文。

这部書沒有殿版，只有鈔本，目前我們已確實知道的共有三部，兩部現藏北京故宮博物院，一部現藏倫敦大英博物院(注十四)。

故宮的兩部，一部原藏重華宮，一部原藏景陽宮(注十五)。重華宮是乾隆即位前的舊邸，即位后每年都在这里与少數民族的王公等會見(注十六)。景陽宮向來就是專門貯藏圖書的地方(注十七)，1926年集中到故宮圖書館殿本書庫貯藏(注十八)，現划歸該館滿蒙藏文書庫，这个影印本的原本就是原來在重華宮的那一部。原藏景陽宮的那一部維吾尔文字体較小。

大英博物院的一部，可能是1900年八国联軍侵入北京時流落到英國去的(注十九)。

此外，沈阳故宮翔鳳閣（俗称七間樓）原藏殿版書籍目錄里也列有五体清文鑑一部，但在1930年沈阳故宮东三省博物館成立圖書室查点存書時已經不在，下落不明。有人說是清室早已提往北京存放(注二十)，如果此說屬实，那末也可能是景陽宮的那一部。

这些書从其編譯目的說，主要是为滿族人学习其他民族語文用的，从其編譯方法上說，最初是用滿文編出，然后再用其他文字翻譯出来的，而滿文是清朝的“國語”，所以題名“清文鑑”。文鑑在这里还有分類辭典的意思，这个時期所編的分類辭典都叫某某文鑑，依字母次序排列的辭典有另外的名称，如：清文總汇、蒙文總汇等。

× × ×

至于这些書的作者：清文鑑的后序上列有两个很长的名单，上面仅各部院侍郎以上的官員就有69人，实际的編者是傅達礼等人，已如上述。两体清文鑑卷首沒有開列工作人員，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上題为“傅恒等奉勅撰”。三体清文鑑四庫提要上題为“阿桂等勅撰”。但是傅恒和阿桂很显然都只是虛領其事(注二一)。三体清文鑑的卷首有一个滿文的詳細的工作人員名单，上面共列95人，領銜的是永瑢，〔滿汉文〕提調官是福顏太、福森布、汉图等，承修官有永安太、賽尙阿、佛住、四宝等六人。蒙文提調官是明泰，承修官是广書、明善、托津等人。永瑢(？—1790年)是乾隆的第六个儿子，在皇室里是一个在文化方面修养較高而未担任实际政治職務的人(注二二)。1784年四庫全書告成時，正總裁就是他。比起傅恒和阿桂来，他还是可能做了一些具体工作的。

藏文部分的主編者，許多人都相信是章嘉第二世(1717—1786年)，

在章嘉的傳記上未見記載此事，但屢次提到他除藏文和梵文外還精通漢、滿、蒙文，他是滿文大藏經、四體楞嚴經、四體大藏全咒的校訂人，能用漢語講授佛經(注二三)。漢文上記載着乾隆對他非常推崇，指示翻譯工作要“就正”于他的地方也很多(注二四)。當時在這方面他是一個权威學者，長期住在北京，圓寂于兩體清文鑑編成以後的15年。因此，我們可以相信藏文部分是經過他審訂的(注二五)。

維吾爾文部分的工作人員，我們沒有找到什麼線索，希望對這方面的材料熟悉的人繼續研究。

乾隆本人對少數民族語言很有興趣，下過一些功夫，他自己敘述到：“朕即位之初，以為諸外藩歲歲來朝，不可不通其語，遂習之，不數年而畢能之。至今則曲盡其道矣（按：此處專指蒙語），侵尋而至于唐古特語，又侵尋而至于回語（按：指維吾爾語），亦既習之，亦既能之，既可以為余暇之消遣，復足聯中外之性情”(注二六)。他又說過：“凡有諭旨兼蒙文者，必經朕親加改正方可頒發”(注二七)。對新疆的維吾爾語的地名翻譯，他也會發表過一些意見(注二八)。藏語方面，他雖然也學過，但他聽班禪講經時，還是要通過翻譯(注二九)，可見藏語尚不够精通。總之，他通滿、漢、蒙三種語言，懂一些藏語和維吾爾語，並且對翻譯工作常發表一些意見(注三十)。因此，這些書前面標着“御制”不一定全是虛名，而是真正參加過一些意見，至少兩體和三體的是這樣的。

筆者不懂滿、蒙、維文，本文是在熟悉滿、蒙文書籍情況的李德啟等幾位同志的幫助之下寫成的。

黃明信

1957年8月

(注一)它們的正式名稱是：御制清文鑑，御制增訂清文鑑，御制滿珠、蒙古、漢字三合切音清文鑑，御制四體清文鑑，為了敘述方便我們用了這些簡稱。

(注二)清史列傳卷六，國朝書獻類征詞臣傳卷一一六，傳達禮傳。

(注三)鮑奉寬遺稿“御制清文鑑提要”。

(注四)四庫舊要現僅存一部鈔本，已被劫往台灣。

(注五)清史稿聖祖本紀：“四十九年正月命修滿蒙文鑑”。

(注六)此書又有1743年殿本，其中的蒙文是用滿文字母拼寫的，編者是班第（李德啟：滿文書籍聯合目錄）。

(注七)參見增訂清文鑑序。

(注八)清宮史續編卷九十二。

(注九)1755年開始編纂，1763年完成的西域圖文志（六種文字對照的中國西部少數民族地區的人名、地名匯編）中已經使用。它的原理在1750年完成的圖文韻統（梵藏漢標準譯音表）里已經形成。薛海“清文鑑”條，把“三合切音”解釋為滿、蒙、漢三種文字，是錯誤的。

(注十)清宮史續編卷九十二。

(注十一)見大英博物院中文書目補編 (Supplementary Catalogue of Chinese Books

and Manuscripts in the British Museum, 1903) 139頁。

(注十二)道光30年(1850年)宣宗实录館从武英殿行取書籍總档上記有：四体清文鑑二部，每部六套，共七十六册。

(注十三)故宮博物院及大英博物院各有一部，北京圖書館沒有。李德启滿文書籍联合目录(1933年)載三体、四体故宮均有鈔本，系刻本之誤。

(注十四)同(注十一)。

(注十五)根据故宮圖書館目录。

(注十六)清宮史續編卷五，乾隆60年諭。

(注十七)見同上書卷五十五“東壁圖書貯景陽”句下原注。

(注十八)陶湘：故宮殿本書庫現存書目弁言。

(注十九)1877年的書目上沒有，1903年的補編上才有，書目的序言里說，他們所得到的一函永樂大典是1900年焚毀翰林院的劫余。

(注二十)据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圖書館处郝瑞甫先生談，郝先生过去在辽宁省立圖書館時曾參加查点故宮存書的工作。

(注二十一)他們兩人在成書的前幾年長期在外面領兵打仗，可參看清史稿兩人本傳。

(注二十二)清史稿列傳七“工画……通天算”；四庫大辭典：“工詩”。

(注二十三)藏文章嘉傳，嵩祝寺版(1787年寫)，第八十八、九十四、一百二十二等頁。

(注二十四)乾隆四体楞嚴經序、同文韻統序、東華錄，乾隆38年2月上諭等。

(注二十五)还有伍勒穆集(从名字看來是蒙古族)是同文韻統的主要校譯者。1767年至1771年任理藩院左侍郎(清史稿部院大臣年表)，两体清文鑑成書的那一年，因病辭職，但仍管唐古特學及經咒館事務，重要的藏文文件仍要由他翻譯(東華錄乾隆朝卷七十四)，卒年不詳，如果藏文部分的翻譯工作在1771年或更早一些的時間就已開始，那末他一定也會參加的。

(注二十六)三体清文鑑序。

(注二十七)東華錄，乾隆44年8月。

(注二十八)東華錄，乾隆40年閏五月：諭“英阿杂尔、哈喇沙尔之名相沿訛錯已久，今既據綽克托奏請改正，以朕所忆而論，將英阿杂尔改稱英吉沙尔，哈喇沙尔改稱喀喇沙尔方与回人(按：指維吾爾人)原音相合”。

(注二十九)藏文章嘉傳，第一百〇九頁。

(注三十)滿蒙文方面他發表的意見很多，可參看東華錄，乾隆44年8月和51年4月等處的記載。

一体至五体

内 书 容 名	编 年 成 代	文 内 容					序	工 職 作 人 員 名 表	凡 例
		满	汉	蒙	藏	维			
清文鑑	康熙 47 年 (1708年)	附有解古文 满并文成 文引注証語					满	在 书 尾	
两清文体鑑	乾隆 36 年 (1771年)	附汉满字文切注音解	附满文对音				满文、汉文		
三清文体鑑	乾隆 44 年 (1779年)	附蒙汉汉文字对切对音音音	附满蒙汉汉文字对切对音音音				满、蒙、汉文卷	满文一卷	汉文一卷
四清文体鑑	?	有	有	有	有				
五清文体鑑	?	有	有	有	附满文切音	附满文对音			
附满文蒙鑑	康熙 56 年 (1717年)	附满文注解			附蒙文注解		满文、蒙文		
附四体合璧鑑	?	有	附满文对音	有	有				

清文鑑內容比較表

总 目 录	正 編					補 編				总 綱	补 总 綱	后 序	版 本	备 考	
	卷	部	类	則	条	卷	类	則	条						
滿文	20	36	280		約 12,000					四	一卷, 一、馬齊	1.2. 殿四寫 版庫本 刻舊本 要			
滿文、汉文	32	35	292	556	約 17,000	4	26	71	1,609	八	二		1.2. 殿四鈔 版庫本 刻全本 书		
滿、蒙、汉文卷	31	36	285	508	約 13,000								1.2. 殿四鈔 版庫本 刻全本 书		
	32	35	292	556	約 17,000	4	26	71	1,609				殿版刻本		
	32	35	292	556	約 17,000	4	26	71	1,609				鈔本		
滿文、蒙文	20									八	一卷, 同清文鑑	殿版刻本			
滿文、蒙文	32		255	561	約 17,000					八		嵩木 祝刻 寺本			

କୁଣ୍ଡଳ ପାତାର କିମ୍ବା ଚରଣରେ ଏହାର ଗନ୍ଧର୍ଜ ପିଲା।

୧ ନେଟି ପ୍ରକାଶ କୁମର ଲୋହି ପରିବାର । ଏହି ଦ୍ୱାରା କୁମର ଲୋହି ପରିବାର କୁମର ଲୋହି ପରିବାର କୁମର ଲୋହି ପରିବାର । ଏହି ଦ୍ୱାରା କୁମର ଲୋହି ପରିବାର କୁମର ଲୋହି ପରିବାର । ଏହି ଦ୍ୱାରା କୁମର ଲୋହି ପରିବାର ।

